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

——基于 CGSS 数据的追踪研究

刘军强 熊谋林 苏阳

摘要：为回应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的争论，并评估过去 10 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析近 10 年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研究基于 5 个时点、44166 个样本，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 10 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不同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等群体的幸福感在过去 10 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但是，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要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尚需对幸福感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追踪和研究。

关键词：幸福感 不平等 经济增长

作者刘军强，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教授（成都 611130）；熊谋林，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1130）；苏阳，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成都 611130）、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

一、引言：双重印象下的中国

中国人的幸福感是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孙立平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认为，中国人生活并不幸福，民生和社会正义问题是造成不幸福的主要原因。^① 基于对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的分析，郎咸平也认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感觉不幸福，他推测，

* 本选题得益于 2008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冯仕政副教授的讨论。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蔡泳教授提供了统计分析方面的指导，彭华民教授、江立华教授对本研究亦提供了支持，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文责自负。

① 赵杨等：《对话社会学专家孙立平：“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南方日报》2011 年 4 月 18 日，第 A04 版。

中国人自感幸福的比例不超过4%。^①但根据《小康》杂志的调查,在2011年,超过6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幸福。^②另据“2011年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超过70%的中国人感觉幸福。^③

另外,邢占军分析了山东省7年(2002—2008)的数据发现,幸福感并没有随人均GDP和居民收入增加而相应增长。^④朱建芳、杨晓兰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数据发现,中国自感幸福的人群从1999年的68%增加到2001年的78%,但是平均值从2.95下降到2.87。^⑤艾普乐顿和宋丽娜研究发现,1995年到2002年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呈明显下降趋势。^⑥利用盖洛普的调查结果,卡恩曼等研究者指出,尽管拥有代表生活水平提高的彩电和电话等物品的用户逐渐增多,但感觉生活幸福的人在1994至2005年间下降了约15%。^⑦

这些充满矛盾的信息和发现来自中国改革、变迁带来的双重印象。一方面,改革推动经济迅猛发展,普通人的生活得到普遍改善。以本研究关注的2003年至2010年为例,中国的GDP增加了2.4倍,人均GDP增加了2.5倍,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分别增加了1.3、1.4倍。即使是在相对薄弱的社会保障方面,与2003年相比,2010年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是8年前的1.7倍,失业保险参保人员是8年前的1.3倍,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是8年前的4倍。^⑧可见,近10年来,在经济仍然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民生保障体系有了长足发展,这为幸福感的提高提供了必要基础。

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凸显。食品药品安全、房屋拆迁、非正常死亡等新闻不断吸引政府和公众的注意力。尤其是贫富差距扩大,讨薪和信访等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令人有“矛盾丛生”的印象。^⑨媒体的推波助澜

① 郎咸平:《序言:我们的幸福与无奈》,《郎咸平说: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② 张旭:《一边是反思,一边是幸福:2011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小康》2011年第11期。

③ 曾利明:《2011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结果发布——逾7成感觉幸福》,2011年12月22日,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1/12-22/3552766.shtml>,2012年6月25日。

④ 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⑤ 朱建芳、杨晓兰:《中国转型期收入与幸福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9年第4期。

⑥ Simon Appleton and Lina Song,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 China: Components and Determinant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6, no.11,2008, pp. 2325-2340.

⑦ Daniel Kahneman and Alan B. Krueger,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0, no.1,2006, pp. 3-24.

⑧ 具体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2010)》, <http://www.stats.gov.cn/tjgb/>,2012年5月25日。

⑨ 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2011年2月16日, <http://sc.people.com.cn/news/HTML/2011/2/16/20110216113747.htm>,2012年4月8日。

将“不幸福”的观感放大。

这就是双重印象下的中国：国民既幸福又不幸福的矛盾画面。究竟应当怎样解读这些冲突的信息？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数据对国民幸福感进行了跟踪性研究。通过对44166个样本，5个时点的分析，力图勾勒出中国国民幸福感变化的总貌、趋势及其演化逻辑，并希望这一研究可在现实政策层面做出一定贡献。研究意义在于：

首先，经济增长能否带来国民幸福感的提高？这一问题已经在国际学术界被争论了几十年之久，也被称为“幸福悖论”。物质生活改善与精神主观感受可能不仅不同步，而且缺少关联。通过对中国个案的分析，可以对幸福悖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检验，从而，在理论上增进对经济增长和民众幸福感关系的认识。

其次，改革使得经济腾飞、物质生活得以改善的同时，也让政体的合法性建立于不稳定的“绩效”（performance）之上。^①普通人的幸福感、满意度是国家治理绩效的“晴雨表”，与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度密切相关。在更深层次上，幸福感这一指标关涉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国家在民生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②10年过去了，宏观的民生投资是否转化成民众日常的幸福感受？那些很少有机会在媒体表达观点的普通人如何感受自己的生活？这些问题都属于重大国情调研范畴，系统扎实的经验研究有助于对近10年的政策作出评估，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研究回顾

（一）幸福感测量

测量个人的幸福感并不简单。首先，人的幸福感受有多个维度，而且这些维度之间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其次，主观感受因情绪、情境、时间而变。基于这些复杂性，问卷调查一般设计与生活相关的多维问题，并综合多个问题的分值以获得最终测量值。^③在实验研究流派中，实验对象每隔一段时间报告幸福感受。^④在实验室

① Zhao Dingxin,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3, no. 3, 2009, pp. 416-433.

②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③ Richard E. Lucas, Ed Diener and Eunkook Suh,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Well-Being Mea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1, no. 3, 1996. pp. 616-628.

④ Daniel Kahneman and Alan B. Krueger,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0, no. 1, 2006, pp. 3-24.

外，研究对象需要携带电子测量器，每隔半小时报告一次幸福程度；研究者统计跟踪数月，最终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① 这一方法可以克服目前大部分测量存在的即时性局限、措辞影响，等等。但这个办法成本太高，即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都不能广泛使用。

在绝大多数研究中，特别是涉及大样本对象、跨时间段的比较研究，最通常采用的测量手段往往是在问卷中设置单个问题来提问（同时也是单时点）。显然这是研究成本约束使然，因为幸福感的问题往往都是“搭便车”在其他大型研究的问卷设计中。但这种采取单项问题来测量综合性幸福感的做法是世界上最广为使用的一种方式，从而使得跨国跨时段的比较成为可能。^② 我们所采用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每一次调查都有幸福感问题设置，这为比较过去 10 年中国人的幸福感变迁提供了可能。^③

单项综合的幸福测量通常采用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或十分序列法等。以 1972 年以来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中使用的问题为例，典型措辞是：“总的来说，你觉得你的生活如何？是很幸福，还可以，还是不幸福呢？”这是一个三分法的问题。四分法、五分法和十分序列法也先后用于其他调查，如世界价值观调查、世界幸福感数据库、盖洛普调查（Gallup Poll）等。研究表明，所测量结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个人的主观幸福状况。这一结果与两个方向的比较高度相关：纵比，个人是否认为目前的幸福状态比过去高；横比，个人的幸福程度是否比他人高。^④

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来测量幸福感可靠吗？罗宾森和谢弗对可靠性问题做了

① Amy Love Collins, Natalia Sarkisian and Ellen Winner, “Flow and Happiness in Later Lif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Daily and Weekly Flow Experienc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10, no. 6, 2009, pp. 703-719.

② Richard A. Easterlin, “Explaining Happ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0, no. 19, 2003, pp. 11176-11183; Ed Diene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5, no. 1, 2000, pp. 34-43; André Duarte, Camila Garcia, Grigoris Giannarakis, Susana Limão, Amalia Polydoropoulou and Nikolaos Litinas, “New Approaches i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Happiness and Transport Economics,” *Netnomics*, vol. 11, no. 1, 2010, pp. 5-32.

③ 诚然，这个变量并不完美，但在多时间点、多维度测量成为可能之前，这个数据提供的分析，有一定参考价值。

④ Ed Diener, Eunkook M. Suh, Richard E. Lucas and Heidi L. Sm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5, no. 2, 1999, pp. 276-302.

系统研究。他们认为上述测量具有“稳定且经得起重复试验的可靠性”。^①此外，测量的有效性问题也值得考虑。威尔逊对自我评估和专家评估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大多数专家的评估与被采访者的自我评估相仿，从而说明该测量具有相当的有效性。^②最后，这类测量的可比性如何？这是一个棘手问题，但这并没有阻碍跨文化和跨群体的比较研究。2003年，伊斯特林在回顾半个多世纪来的研究时，对幸福测量指标有乐观评价：“这样提出问题来测量幸福，其可靠性、有效性和可比性已经引发了相当丰富的研究，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一致认为，研究对象对问卷的回答虽然有些问题，但总的来说富有研究价值，并且可以用来进行跨群体的比较”。^③

（二）幸福悖论：40年的学术争论

经济增长会带来更多的幸福吗？更多的钱，是否意味着更多的幸福？伊斯特林在1973年提出两个问题：“富裕国家的人们通常比贫穷国家的人们更幸福吗？所有人的收入提高会增加整体的幸福感吗？”他认为：“对所有国家来说，个人范围内，越多的钱意味着更多的幸福。然而，所有成员的收入增加并不会增加所有成员的幸福。幸福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这个逻辑结构错误的经典例子——对个体正确的事情不一定在整体上成立。”^④在1974年的经验研究中，伊斯特林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幸福悖论”。^⑤

然而，一些经验研究对幸福悖论提出质疑。韦胡文提出绝对幸福理论，他认为不存在相对、变动的幸福标准，人们的幸福感受以基本需求为标准，是天生和固有的情感。^⑥他使用盖洛普1975年国家间的主观幸福感民意测验数据，发现各国的人均GNP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达0.84 ($p < 0.01$)。为回应韦胡文的挑战，伊斯特林再次论证欧美发达国家自1973年以来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主观幸福感呈下降

① John P. Robinson and Phillip R. Shaver, *Measure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Appendix B to Measure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nn Arbor,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69, p.17.

② Warner R. Wilson,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67, no.4, 1967, pp. 294-306.

③ Richard A. Easterlin, "Explaining Happiness," pp.11176-11183.

④ Richard A. Easterlin, "Does Money Buy Happiness?" *The Public Interest*, vol.30, no. 10, 1973, p. 4.

⑤ Richard A. Easterli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 A. David and W. R. Melvin,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1974, pp. 89-125.

⑥ Ruut Veenhoven, "Is Happiness Relat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24, no.1, 1991, pp. 1-34.

趋势。^①他指出,“国民相对收入增加所应该带来的主观幸福感变化,被社会整体的平均收入增加所抵消,这造成一个国家的整体幸福感判断标准实际上还是没有变”。^②对此,韦胡文等研究了西欧各国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指出在过去50年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民幸福感均有明显上升。^③这一结论得到斯蒂文森和沃尔夫的支持,他们分析了近100个国家的资料,发现经济增长和幸福感增长成正相关。^④

鉴于更多的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幸福感的正面关系,伊斯特林于2010年修正了幸福悖论。^⑤新修正的幸福悖论更加强调幸福感变化的长期效应。即,从长期看,经济增长能够提高幸福感的空间必然有限,当一个国家的主观幸福感受经济发展影响而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它可能出现停滞或下降状态。虽然从短期看,包括发展中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和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相同的上升或下降趋势。他特别强调中国、巴西、韩国的幸福感下降和经济增长的不协调趋势。为此,伊斯特林等2012年专门对中国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发现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民众生活满意程度的相应提升。^⑥

(三) 中国幸福感研究现状

近年来,对于中国公民幸福感的研究,国内学者在文献梳理、主观幸福感量表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⑦官皓根据“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08年的数

① Richard A. Easterlin, “Will Raising the Income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27, no.1,1995, pp. 35-47.

② Richard A. Easterlin, “Will Raising the Income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pp. 35-47.

③ Ruut Veenhoven and Michael Hagerty, “Rising Happiness in Nations 1946-2004: A Reply to Easterli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79, no.3,2006, pp. 421-436.

④ Betsey Stevenson and Justin Wolfers, “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 *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39, issue 1, (Spring 2008), pp. 1-102.

⑤ Richard A. Easterlin, Laura Angelescu McVey, Malgorzata Switek, Onnicha Sawangfa and Jacqueline Smith Zweig,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07, no.52, 2010, pp. 22463-22468.

⑥ Richard A. Easterlin, Robson Morgan, Malgorzata Switek and Fei Wang,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Sciences*, vol.109, no.25,2012, pp. 9775-9780.

⑦ 丘海雄、李敢:《国外多元视野“幸福”观研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邢占军:《基于六省会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心理科学》2008年第6期。

据,发现居民幸福感均值为3.416,且84.9%的受访者报告对生活表示满意。^① 罗楚亮利用CHIP数据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区分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作用。^② 王鹏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分析了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③ 另外,城乡差距、社保发展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也被纳入研究视野。^④ 这些研究为了解中国国民幸福感提供了基础,不过,较长时期内幸福感变化及其影响机制还没得到细致探讨。零点调查公司从2000年起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追踪。^⑤ 调查发现,虽然有一定波动,但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基本呈上升趋势。2000年平均得分为3.25,2009年得分为3.54(图1)。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未能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的多元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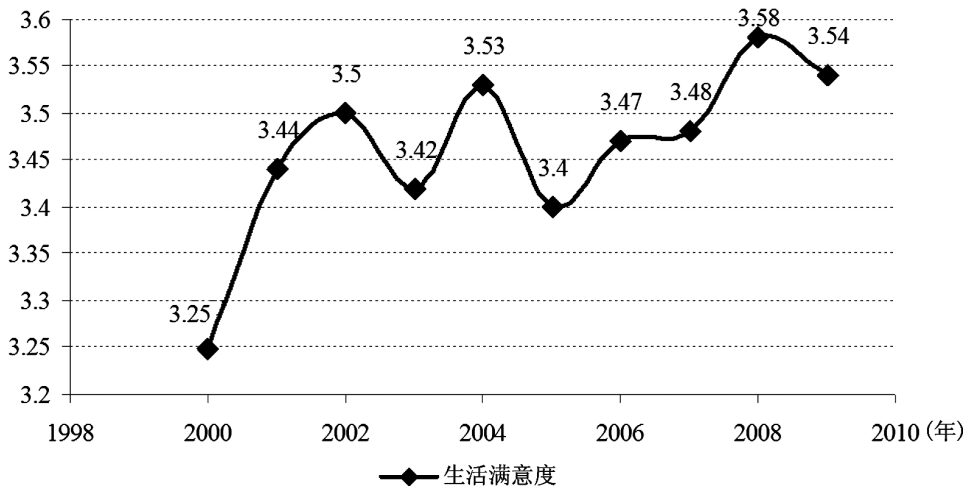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

资料来源:袁岳、张慧:《2009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国外对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研究较多,但研究结果并不统一。这主要由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和观测时点的不同所致。

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布洛克曼等发现,尽管中国从1990年到2000年的经

① 官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南开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
 ② 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2009年第11期。
 ③ 王鹏:《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3期。
 ④ 王友华、荀琼玉、郭晖:《中国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差异及其生活态度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15期;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2期。
 ⑤ 袁岳、张慧:《2009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经济增长较快，但中国人的幸福感均值下降了 0.9。^① 然而，斯万布鲁发现，中国公民的幸福感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而出现上升趋势。^② 世界幸福感数据库的最新数据显示，2001 至 2007 年，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在 1—4 分序列中增加了 0.07，在 1—10 分序列中增加了 0.12。^③ 盖洛普近十多年来一直在跟踪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调查发现，中国经济虽增长迅速，但居民生活满意度却是一条令人奇怪的“水平线”。^④ 从 1999 到 2010 年，中国农村人口的生活分值下降了 0.13，但城镇居民上升了 0.43。尽管从幸福的比例来看，表达生活满意的人从 1999 年到 2010 年上升了 5%，但是幸福感趋势在高、低收入群体中的变化却并不明显。

三、中国国民幸福感：总貌和趋势

(一) 数据介绍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国民幸福感。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在大陆地区对不同人群开展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⑤ 我们选择 2003 年至 2010 年间 5 次抽样调查获得的全部数据，共计 44166 个样本。其中，男性共计 20997 人（47.52%），城镇居民 25573 人（57.96%）。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提供的历年人口资料，我们对样本的代表性进行了分析，进而决定对 2005、2006、2008 和 2010 年样本中的城乡、性别比例进行联合加权处理。2003 年的调查在城镇进行，所以样本中只有约 7% 的农村人口。该样本在

① Hilke Brockmann, Jan Delhey, Christian Welzel and Hao Yuan, “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0, no. 4, 2009, pp. 387-405.

② Diane Swanbrow, “Happiness is Rising Around the World,” *News Servic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une 27, 2008, <http://ns.umich.edu/new/releases/6629-Happiness%20is%20rising%20around%20the%20world-%20U-M%20study>, accessed on October 19, 2012.

③ Ruut Veenhoven, “Distributional Findings on Happiness in China (CN),”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http://worlddatabaseofhappiness.eur.nl/hap_nat/nat_fp.php?cntry=36&name=China&mode=3, accessed on May 20, 2012.

④ Steve Crabtree and Tao Wu, “China’s Puzzling Flat Line,” *Gallup Business Journal*, August 10, 2011, <http://businessjournal.gallup.com/content/148853/china-puzzling-flat-line.aspx#1>, accessed on May 1, 2012.

⑤ 2003 年和 2005 年的调查不包括西藏、青海和宁夏省区；2008 年的调查不包括西藏、青海和海南省区。

城乡人口分布方面显然不能代表全国，因此我们仅对2003年的性别比例加权。为拥有更多的观测时点，在绝大多数的分析中我们保留了2003年的样本。这使得城乡方面代表性的缺憾显而易见，但这个处理并不影响主要结论。

关于幸福感的问卷设计，2003、2005、2006、2010年的问题是：“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受访者回答选项是“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2008年问卷设计的问题是：“整体来说，您觉得快不快乐？”受访者回答选项分别是：“很快乐，还算快乐，普通，不太快乐，很不快乐”。按照幸福(happiness)的定义，“快乐”(happy)也是“幸福”的另外一种表达。我们将受访者回答幸福的答案按1至5分序列统一计数(1=非常不幸福，2=不幸福，3=一般，4=幸福，5=非常幸福)，并用统计软件Stata整合各年度的相关变量后，得出本文的分析数据。

(二) 总体情况

如图2所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显示，2003年到2010年期间，总体上有53.0%的公民感觉生活幸福或很幸福，有36.6%的公民感觉一般，有10.4%的公民自感生活不幸福或很不幸福。此外，2003年至2010年，居民的幸福感分数均值为3.51(满分为5分)。可见，无论是从幸福感的分布还是分值来看，超过半数的中国人是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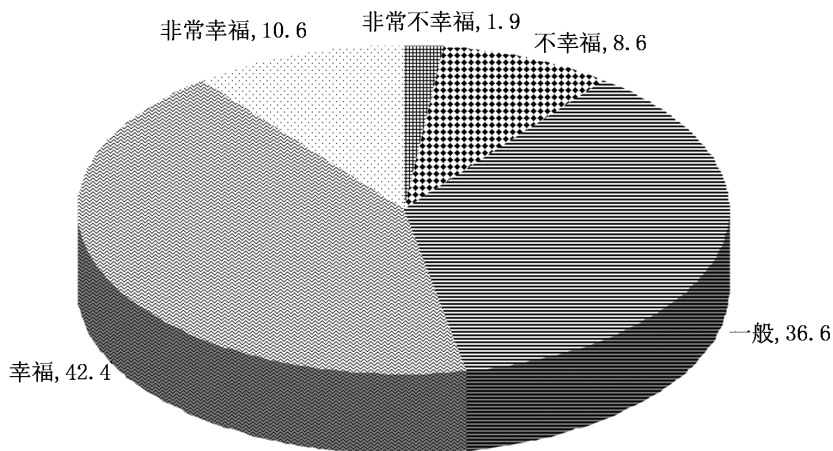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人幸福感总体分布情况(2003—2010)(%)

(三) 变化趋势

对幸福感变化趋势的统计分析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呈上升趋势(图3)。回答幸福的人群从2003年的32.2%上升到2010年的56.6%。回答非常幸福的人群从2003年的5.1%上升到2010年的16%。回答非常不幸福的人群从2003年的2.3%下降到2010年的2.1%。回答不幸福的人群有显著下降趋势，

从2003年的10.6%下降到2010年的7.7%。变化最大的是回答一般的人群,从2003年的49.8%下降到2010年的17.7%。各年度幸福感1—5分的均值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平均值都在3分以上。由于3分以上代表幸福,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公民总体上是幸福的。在趋势上,中国公民幸福感均值从2003年的3.27上升到2010年的3.77,这进一步印证了图3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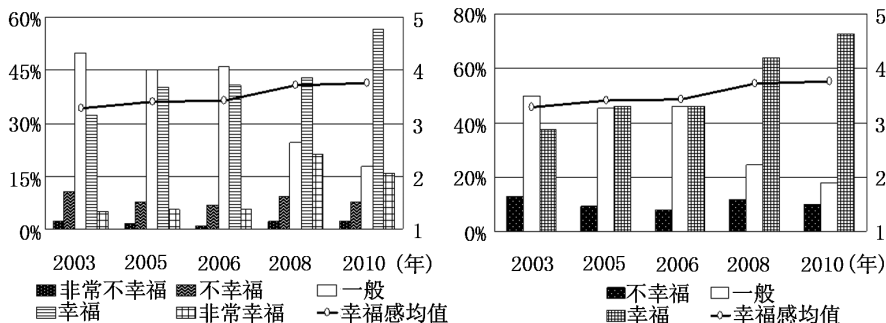


图3 公民幸福感趋势分布图 (2003—2010)

我们将回答幸福和非常幸福重新组合为幸福,非常不幸福和不幸福重新组合为不幸福。重组后的数据显示,自感幸福的人从2003年的37.3%上升到2010年的72.6%,2010年自感幸福的人约是2003年的2倍。自感不幸福的人从2003年的12.9%下降到2010年的9.8%,自感不幸福的人减少了1/4。

(四) 国际比较

最新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提供了全球50个国家从1981至2008年的5次调查数据。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提供了从1972年到2010年的全部数据。为与中国比较,我们选择从2000年前后开始,延续到各国的最新调查数据。^①由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问卷采用1—4分序列,美国综合社会调查采用1—3分序列。因此,我们将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非常幸福和幸福整合到一起。同时,我们也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五分法问卷按照四分法重新修正。由于问卷设计不同,这些比较仅是一种趋势考察。在与多个国家进行比较时,表1列出世界价值观调查中2001年和2007年对中国的幸福感调查的两次数据。

表1 主要国家自感幸福的群体变化趋势

国家	跨年度	变化 (%)	国家	跨年度	变化 (%)
美国 (-)	1999—2006	94.0→92.8	南非 (-)	2001—2007	82.0→80.9
英国 (+)	1998—2006	90.4→93.4	俄罗斯 (+)	1995—2006	51.1→69.6
加拿大 (-)	2000—2006	95.9→95.3	墨西哥 (-)	2000—2005	92.4→91.0

^① 需要说明的是,世界价值观调查提供的调查数据并不连续。例如,巴西的调查数据仅是1997年和2006年两次调查的对比,阿根廷只有1998年和2006年的调查数据。

续表 1

国家	跨年度	变化 (%)	国家	跨年度	变化 (%)
土耳其 (+)	2001—2007	76.6→85.8	阿根廷 (+)	1999—2006	81.7→86.6
挪威 (+)	1996—2008	94.5→96.5	埃及 (-)	2000—2008	89.6→84.2
芬兰 (-)	1996—2005	92.3→91.8	智利 (+)	2000—2005	80.3→82.2
德国 (-)	1997—2006	81.5→80.4	伊朗 (+)	2000—2007	62.6→80.4
日本 (+)	2000—2005	89.2→89.7	越南 (0)	2001—2006	92.4→92.4
韩国 (-)	2001—2005	87.7→87.4	秘鲁 (+)	2001—2008	66.2→68.1
巴西 (+)	1997—2006	82.9→90.4	中国 (-)	2001—2007	78.1→76.7

注：“-”表示感觉幸福的人群减少，“+”表示感觉幸福的人群增加，“0”表示无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 World Values Survey 数据计算。

数据显示，美国、加拿大等国自感幸福的人群在 2000 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图 4、表 1）。在发展中国家中，伊朗等多数国家呈上升趋势。那么，为什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幸福感变化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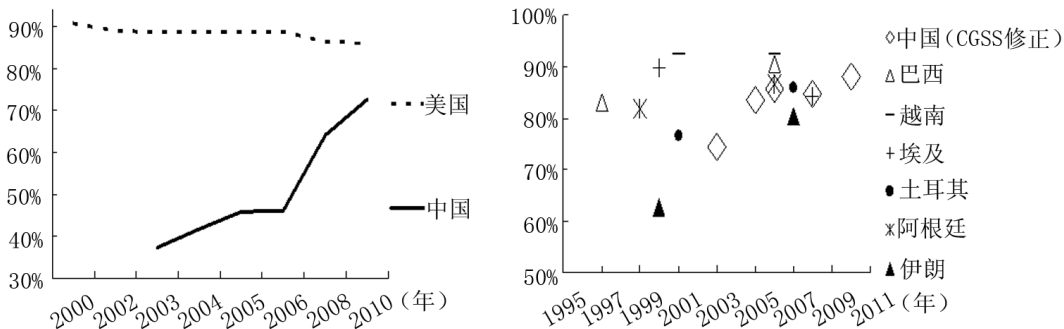


图 4 幸福感变化跨国比较

数据来源：美国 General Social Survey；① World Values Survey；②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经济增长和幸福感饱和，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幸福感趋势出现差别的部分原因。从经济水平的宏观观测角度，发达国家的社会行为模式趋于稳定，如消费和生活态度等。相对于民众有增无减的幸福感预期，宏观水平的提升对民众个体的生活并无实质性提高。例如，美国经济基础较好，但对与社会福利、消费有关的生活变化并无实质影响，这就造成其国民幸福感增长趋势的停滞。自感幸福的人群呈下降趋势是受微观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使美国人的收入中位数自 2000 年以后下降了 7%，预期收入减少与失业等社会压力相互结合，这造成幸福感的下降。^③ 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市场和经济活力上

① <http://www3.norc.org/GSS+Website/Download/STATA+v8.0+Format/>，2012 年 9 月 10 日。

② <http://www.wvsevsdb.com/wvs/WVSDData.jsp>，2012 年 9 月 10 日。

③ Phil Izzo, “Bleak News for Americans’ Incom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 October 14, 2011; Gerrit Antonides, “Income Evaluation and Happiness in the Case of

升的潜力较大，就业和福利的相对变化空间非常大。这种变化在短期几年内就会出现，这些惠及国民的真实感受激发了生活态度转变。所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幸福感出现了相应增长。^①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2003年到2010年各种经济综合指数快速提高，为幸福感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幸福感变化的群体结构

2003年至2010年中国国民幸福感调查的总体情况，虽然可以解答公民的幸福感受，但没有区分各种群体的差异。我们将“幸福”和“非常幸福”整合为感觉幸福的群体；然后，根据政治身份、城乡、年龄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等社会经济指标比较各群体的幸福感比例，从而反映出8年间中国公民主要群体自感幸福的变化情况。

2003年至2010年，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自感幸福的人群分别增长了33.9%、36.5%，这说明幸福感的群体变化并不因受访者的政治属性有异。以户口计，农村和城镇自感幸福的公民分别增加了35.7%和37.6%，这反映出城乡差异并不影响公民幸福感增强的趋势。由于2003年样本的特殊性，对这一结果有必要做两点说明。其一，该年调查只在城镇实施，少量的农村户口可能主要是打工者和探亲者，显然这不能代表全国的农村人口。但是根据这个群体计算的平均幸福感，仍具有参考价值，并且也符合其他4个时间点样本所反映的趋势。其二，城镇曲线表明，如果不包括农村样本，增长趋势不变。

在各年龄群体中，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自感幸福的比例分别增加了36.1%、37.0%、31.7%。我们还将个人年收入低于1万元的受访者界定为低收入人群，收入在1—3万元的界定为一般收入人群，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受访者界定为高收入人群。数据显示，低收入、一般收入、高收入人群自感幸福的比例分别增加了35.5%、26.5%、20.4%，这反映出各收入群体均自感更加幸福。根据受访者对婚姻现状的回答，我们整合为未婚、已婚、丧偶离异三个变量。数据显示出，未婚、已婚、丧偶离异群体自感幸福的情况分别增长了34.2%、35.7%、

① an Income Decline,” *KYKLO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ocial Sciences*, vol. 60, no. 4, 2007, pp. 467-484.

① Richard A. Easterlin, et al.,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7, no. 52, 2010, pp. 22463—22468; Richard A. Easterlin and Laura Angelescu, “Happiness and Growth the World Over: Time Series Evidence on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Bonn, German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4060, 2009.

39.2%。根据受访者的民族属性,我们描述了变量较多的前5个民族的自感幸福情况。汉族、满族、回族、壮族、维吾尔族分别增加了35.4%、33.9%、43.9%、30.8%、30.5%。

从各个群体的幸福感趋势图来看(图5),对幸福的感受程度在各群体内尚存一定差别。通过2003年与2010年各个群体自感幸福的比例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这8年间中国自感幸福的国民总数在逐渐增多。2010年各群体自感幸福的数量均保持在2003年的2倍左右,这与中国公民幸福感变化的总体情况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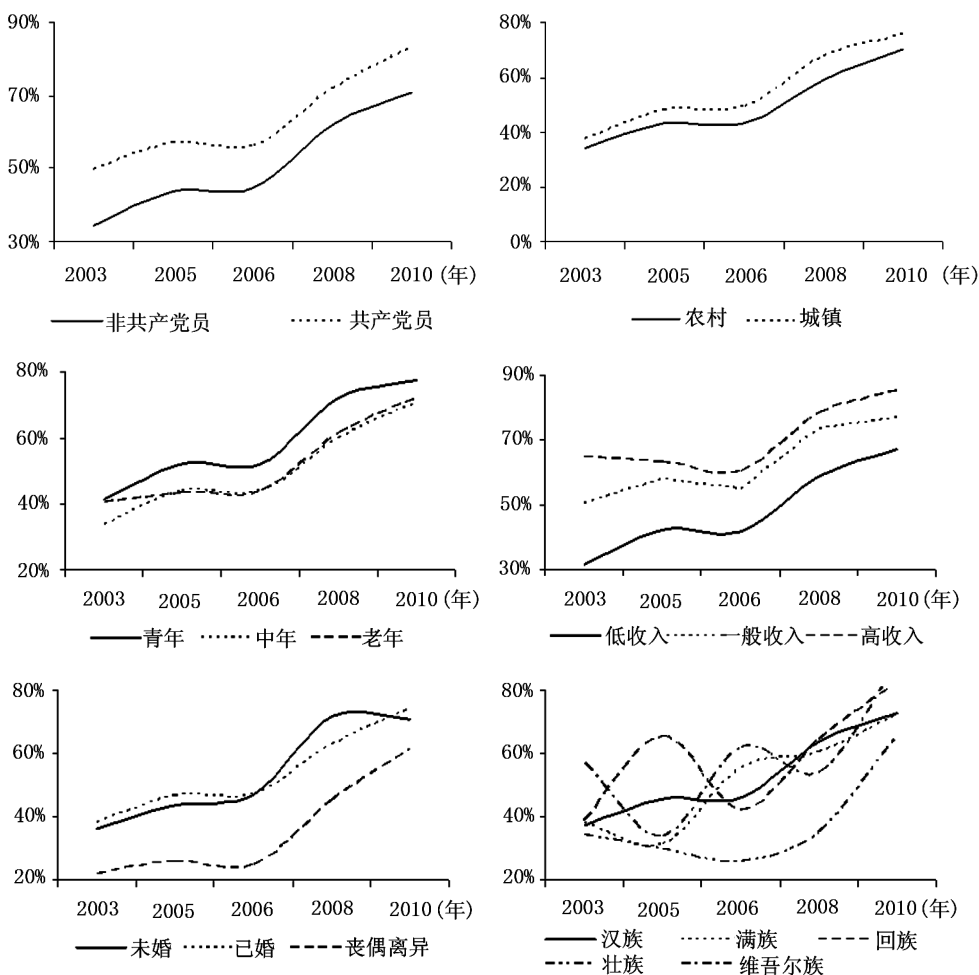


图5 各群体幸福感变化趋势

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群体性事件对幸福感是否有影响及其影响程度。2006年和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设计与群体性事件有关的问题。如表2所示,无论是否亲自经历群体性事件,自感幸福的上升趋势并没有较大区别,两个群体自感幸福的增长趋势明显。未感受到群体事件的自感幸福受访者增加了26.7%,感受到群体的自感幸福受访者仍然增加了30.3%。即使与群体事件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人,2006年到2010年5年时间内,幸福感也增加了34.4%。

表 2 群体事件与幸福感分布

	周围无群体事件 (N:%)		周围有群体事件 (N:%) ^a			
			无利害关系		有利害关系	
幸福感	2006 年	2010 年	2006 年	2010 年	2006 年	2010 年
不幸福	684 (7.8)	986 (9.6)	54 (7.5)	75 (8.3)	47 (11.0)	72 (13.3)
一般	4145 (46.2)	1816 (17.8)	317 (43.9)	137 (15.1)	220 (54.1)	94 (17.3)
幸福	4188 (46)	7438 (72.7)	351 (48.6)	702 (76.7)	145 (34.9)	377 (69.3)

注：^a 与周围群体事件是否有利害关系，可组合为感受到群体事件类别的幸福感结构。

对各个群体幸福感变化情况进行考察后，本文可以回答开篇提出的疑惑。过去 10 年，中国公民的幸福感不是降低了，而是呈上升趋势。这种幸福感增加不是局限在某一个特殊群体，而是大多数群体所共有的趋势。

五、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上述描述性分析，初步勾勒了中国国民的幸福感分值在逐年增加这一状况。那么，这些是错觉（比如，时间变量和幸福感的伪相关），还是客观真实（统计上显著）？可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作出回答。

（一）研究设计

近几十年的研究已经总结出相对成熟的模型去解释主观幸福感，它们一般都指向十几个具有显著性水平的解释变量。研究认为，性别、年龄、教育、宗教、婚姻、民族、就业、个人收入、健康、人际关系等是解释幸福感的重要变量。^① 我们在回归分析中采纳了已有研究确定的有效变量。同时，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所能提供的 5 年共有的变量，排除了若干变量。比如，虽然健康变量应该是重要的回归因子，但由于该数据库中只有 3 年的数据有该变量，就只得放弃之。

综合考察诸多文献，已有研究发现基本上可归纳为两个类型。一是确定各种福利因素、婚姻、年龄、收入等对幸福感的增加具有显著作用。与情理相符，这些因

^① John F. Helliwell,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nomic Modeling*, vol. 20, no. 2, 2003, pp. 331-360; John Knight, Lina Song and Ramani Gunatilaka,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20, no. 4, 2009, pp. 635-649; D. C. Shin and D. M. Johnson,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5, no. 1-4, 1978, pp. 475-492; 王鹏：《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 年第 3 期。

素会带来幸福,只是不同的研究所得出的影响水平有所不同。二是将幸福感置于比较框架。比较的维度有两个:一是横比(与周围的人相比,自己处于什么地位);另一个是纵比(与自己的过去比,今天的幸福感怎么样)。确立了这两个基本维度后,我们结合其他因素来观察幸福感是如何在各年度变化的。

表3 回归模型中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样 本	均 值	最小值	最大值	解 释
幸 福		44100	3.513	1	5	1—5分序列变量
幸 福*	不幸福/一般		(参照组)			
	幸 福	44100	0.530	0	1	虚拟变量, 1=幸福
	2003年		(参照组)			
	2005年	44100	0.199	0	1	虚拟变量, 1=2005
	2006年	44100	0.200	0	1	虚拟变量, 1=2006
	2008年	44100	0.202	0	1	虚拟变量, 1=2008
性 别	2010年	44100	0.204	0	1	虚拟变量, 1=2010
	男 性		(参照组)			
	女 性	44100	0.486	0	1	虚拟变量, 1=女性
年 龄	18—30		(参照组)			
	31—40	44100	0.242	0	1	虚拟变量, 1=31—40岁
	41—50	44100	0.231	0	1	虚拟变量, 1=41—50岁
	51—60	44100	0.189	0	1	虚拟变量, 1=51—60岁
	61—70	44100	0.115	0	1	虚拟变量, 1=61—70岁
	71—100	44100	0.032	0	1	虚拟变量, 1=71—100岁
婚 姻	未 婚		(参照组)			
	已 婚	44026	0.831	0	1	虚拟变量, 1=已婚
	丧偶或离异	44026	0.059	0	1	虚拟变量, 1=丧偶或离异
政治身份	非共产党员		(参照组)			
	共产党员	42973	0.121	0	1	虚拟变量, 1=共产党员
户口类型	农 村		(参照组)			
	城 镇	44100	0.553	0	1	虚拟变量, 1=城镇户口
教 育		44047	8.964	0	19	连续变量, 受教育年数
个人年收入 ^a		36721	1.117	0	40	连续变量(万元)
现在主观社会地位		43342	2.261	1	5	1—5分序列变量
与以前相比, 社会地位变化		42690	2.014	1	3	1—3分序列变量

注:^a20个50万元以上的偏值(outlier)被剔除。

表3罗列了回归模型中的变量。在因变量方面,我们为OLS回归模型设置了一个连续变量的幸福感测量(1—5),也为Logistic回归模型准备了一个虚拟变量以实现幸福感测量(1和0)。在自变量方面,除一系列人口和收入变量外,还引入横比

和纵比两个变量。

(二) 研究发现

表 4 是对因变量变化及自变量作用所做的表达,我们使用了 6 个 OLS 多元回归模型。这里的因变量是取值为 1 至 5 分的幸福感变量。在模型 1,我们将 2005—2010 年 4 个年度设置为虚拟变量,从虚拟变量所对应的幸福感均值可以看出逐年的变化。以 2003 年为参照,4 个回归系数都为正,这显示出各年度的幸福感分值在逐年增加。模型中的常数为 2003 年的幸福感均值,这个模型所揭示的内容与前述所计算的平均值变化是一致的(参见图 3 中的曲线)。

表 4 中国国民幸福感相关因素 OLS 回归系数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年 度	2003	参照组	参照组	参照组	参照组	参照组	排除该年 (参照)
	2005	0.125***	0.186***	0.189***	0.161***	0.097***	
	2006	0.151***	0.221***	0.214***	0.180***	0.251***	0.148***
	2008	0.420***	0.466***	0.455***	0.443***	0.318***	0.226***
	2010	0.495***	0.556***	0.536***	0.473***	0.566***	0.456***
性 别	男 性	参照组					
	女 性		0.042***	0.080***	0.096***	0.069***	0.050***
年 龄	18—30	参照组					
	31—40		-0.199***	-0.161***	-0.180***	-0.128***	-0.127***
	41—50		-0.285***	-0.224***	-0.220***	-0.148***	-0.151***
	51—60		-0.253***	-0.136***	-0.138***	-0.087***	-0.086***
	61—70		-0.148***	-0.002	-0.017	0.022	-0.002
	71—100		-0.028	0.173***	0.153***	0.169***	0.166***
婚 姻	未 婚	参照组					
	已 婚		0.189***	0.217***	0.224***	0.230***	0.233***
	丧偶或离异		-0.218***	-0.167***	-0.163***	-0.090***	-0.075**
政治身份	非共产党员	参照组					
	共产党员		0.224***	0.146***	0.141***	0.087***	0.077***
户 口	农 村	参照组					
	城 镇		0.104***	-0.015	-0.042***	0.029***	0.025**
教 育				0.032***	0.025***	0.017***	0.019***
个人年收入					0.043***	0.017***	0.013***
现在主观社会地位						0.234***	0.230***
与以前相比,地位变化						0.190***	0.165***

续表 4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常 数	3.272 ***	3.152***	2.831***	2.892***	2.006***	2.170***
N	样 本	44100	42903	42852	36192	34621	29905
	R ²	0.048	0.081	0.096	0.104	0.203	0.177

注：p* < 0.1, p** < 0.05, p*** < 0.01 (双尾)。

在模型 2 中，引入性别、年龄等一系列人口变量。结果显示，年度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有更加显著的增加。这说明控制这些人口变量后，各年度的幸福感变化更加明显。同时，这些人口变量也显示出一些变量群体间的其他信息。例如，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幸福些；农村人口比城镇人口幸福些；^① 共产党员比群众更幸福些；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幸福些；年龄影响下的幸福感呈 U 形：18—30 岁群体和 70 岁以上群体更幸福，中间的年龄组较不幸福；婚姻方面，已婚者比未婚者幸福，离婚和丧偶者较不幸福。

模型 4 引入个人年收入变量后，年度变量的增长仍然显著。从回归模型上看，个人年收入（以万元计）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影响系数达到 0.043。^② 比如，如果甲和乙收入相差 10 万元，则幸福感分值就有 $10 \times 0.043 = 0.43$ 的区别。

模型 5 引入横比和纵比两个自变量后，年度虚拟变量的系数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这两个变量本身对幸福感分值有很大的预测力，使得整个模型的决定系数 R² 从 0.104 增加到 0.203。相比于模型 4，仅这两个变量加入后，就解释了幸福感 9.9% 的差异。应该说，纵比和横比两个变量对自感幸福程度的影响非常大，其与幸福感呈正相关，这也说明相对地位的追求和实现程度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③

针对 2003 年样本的特殊性（仅覆盖城镇人口），分别为两种回归分析增加了模型 6。该模型只对 2005、2006、2008、2010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所显示的规律一致。

① 在引进教育变量前，城镇变量的系数为正，表示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幸福（表 4 和表 5，模型 2）。这一结果与我们上面图表介绍的描述性统计一致（例如图 5）。但是引入教育变量以后，城镇变量的影响变为负值（表 4，模型 3）。这可能因为是在同等学历者中，农村人更容易满足些。我们用逐步回归（stepwise regression）对收入等其他变量做了相对的分析，发现只有教育变量有这个效果。如何理解这个结果呢？第一，控制教育变量之前，城镇变量的正值影响包含了教育的差异带来的影响，因为城镇教育水平大大高于农村，而且教育与幸福感正相关。第二，同等学历的样本中，城镇人口可能对幸福的期待值高于农村人口，因而实际幸福感就低些。这些分析被后续的模型所支持：当我们控制与幸福期待有关的两个变量（横比变量和纵比变量）后，城镇变量恢复为正值（表 4，模型 5）。

② 控制通胀水平（CPI）后，个人年收入的增长与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显著。

③ Richard Layard, "Human Satisfaction and Public Polic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0, no. 360, 1980, pp. 737-750.

表 5 中国国民幸福感相关因素 Logistic 回归 Odds Ratio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年 度	2003	参照组	参照组	参照组	参照组	参照组	排除该年
	2005	1.393***	1.607***	1.629***	1.534***	1.357***	(参照)
	2006	1.417***	1.669***	1.656***	1.518***	1.936***	1.400***
	2008	2.875***	3.230***	3.201***	3.149***	2.655***	1.965***
	2010	4.447***	5.302***	5.206***	4.363***	6.575***	4.690***
性 别	男 性	参照组					
	女 性		1.096***	1.193***	1.266***	1.190***	1.143***
年 龄	18—30	参照组					
	31—40		0.639***	0.691***	0.650***	0.719***	0.729***
	41—50		0.545***	0.620***	0.603***	0.694***	0.687***
	51—60		0.572***	0.737***	0.723***	0.801***	0.799***
	61—70		0.725***	0.996	0.953	1.056	0.992
	71—100		0.880*	1.383***	1.284***	1.395***	1.422***
婚 姻	未 婚	参照组					
	已 婚		1.522***	1.626***	1.672***	1.826***	1.810***
	丧偶或离异		0.662***	0.737***	0.749***	0.908	0.891
政治身份	非共产党员	参照组					
	共产党员		1.722***	1.459***	1.437***	1.283***	1.287***
户口类型	农 村	参照组					
	城 镇		1.237***	0.957*	0.872***	1.060*	1.039
教 育				1.075***	1.052***	1.040***	1.048***
个人年收入					1.198***	1.083***	1.063***
现在主观社会地位						1.779***	1.749***
与以前相比, 地位变化						1.706***	1.621***
N		44100	42903	42852	36192	34621	29905

注: $p^* < 0.1$, $p^{**} < 0.05$, $p^{***} < 0.01$ (双尾)。

在前述分析中(图 2-4), 我们用频率和百分数来说明幸福感分值的增加。即自感幸福的比例反映了不同群体的人口总数在增加。为论证这个结论在多元回归条件下仍成立, 更为贴切的回归模型应是 Logistic 回归。因此, 继续使用一个虚拟变量来做因变量(1=非常幸福或者幸福, 0=一般、不幸福或者非常不幸福)。表 8 诸模型所显示的结果与上述 OLS 的结果基本一致。如果只看模型 5, 当各个变量都受控制时, 与年度变量有关的发生比率(Odds Ratio)反而增大且显著。中国国民在 2005 年幸福的概率(用 odds 来表示)是 2003 年的 1.357 倍。同理, 在 2006、2008 和 2010 年的比例分别是 2003 年的 1.936、2.655 和 6.575 倍。即使排除 2003 年城

镇调查获得的样本后，模型6以2005年城乡调查样本为参照，2010年的幸福概率仍然是2005年的4.690倍，这足见幸福感逐年递增。

(三) 如何解释幸福总量的增长

上述多元回归分析除进一步确定幸福感分值的增长趋势外，还有一个目的：提供理解这个增长的线索。就后一个目的而言，上述努力可谓得失参半。一方面，回归模型确定了对幸福有解释力的一系列变量，而这些变量的取值从2003到2010年(5次)基本呈增加趋势。比如，模型中个人收入变量与幸福感正相关，而个人收入在10年中有极大的增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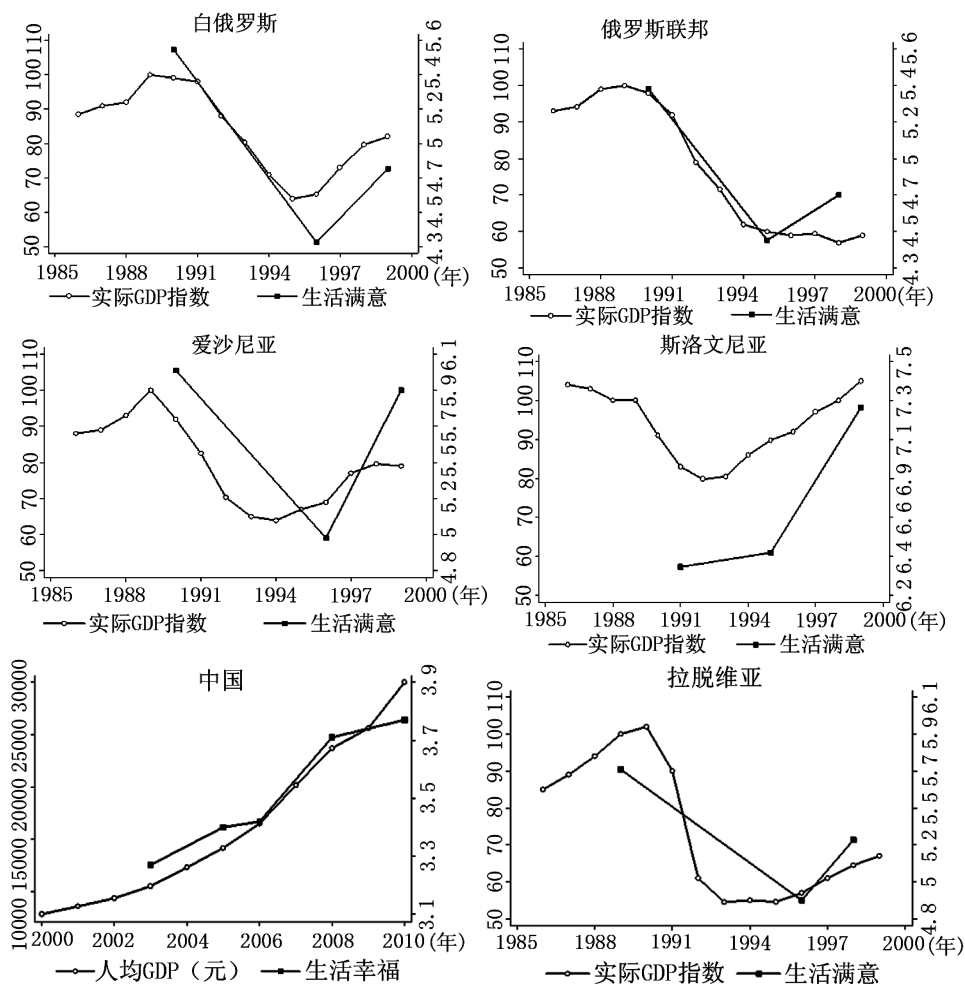


图6 主要转型国家GDP与幸福感分值趋势图

资料来源: Easterlin, 2009; ①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年)。

① Richard A. Easterlin, "Lost in Transition: Life Satisfaction on the Road to Capit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71, no. 2, 2009, pp. 130-145.

另一方面，在回归模型中（表 4、表 5），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被引入后，并没有使得年度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缩小，更没有使之消失，或者使发生比率接近 1。这意味着幸福总量的增长并不能通过这些控制变量取值的增长得到解释。幸福总量的增长与其他未知因素有关。我们目前拥有的数据对探讨这些“其他因素”不能提供较好的解决方案。但是不妨引用一个跨国研究，做一个大胆的猜测。伊斯特林在 2009 年对 13 个转型国家的幸福指标和逐年的 GDP 做了对比，他发现幸福指标的升降曲线与 GDP 趋势呈现极大的相似性（1989=100）。比如，白俄罗斯 GDP 和生活满意分值在 19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均急剧下滑，于 1990 年代中期急剧上升。以下是其中几个国家的对比曲线（图 6）。

与几个转型国家相比，中国在 2003—2010 年间人均 GDP 和幸福感的变化趋势更趋一致：两者都是逐年上升。因此，我们推测：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幸福指标的增长是 GDP 的增长使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总量增加的关键因素。不过，要确定这两者的因果关系，尚需进行更多的经验研究。

六、结语：当经济不再高速增长

中国国民的幸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国情调研主题。理论上，过去 10 年的经济增长和民生建设可能会提升国民的幸福感，然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微观问题同样可能抵消这些努力。幸福感的测量受数据、方法、价值、立场等因素制约，这使得国内外的研究难以取得一致结论。通过对 2003—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勾勒了中国国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总体而言，过去 10 年间，虽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人口不幸福状况，但 53.0% 的公民感觉生活幸福或者很幸福。从趋势上看，自感幸福的人群从 2003 年的 37.3% 上升到 2010 年的 72.6%；幸福感的均值从 3.27（2003 年）提高到 3.77（2010 年）。

第二，根据政治身份、居住地、年龄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以及群体性事件关联等因素分析了幸福感变化的群体结构。研究发现，虽然各社会群体的幸福感有所差异，但各群体的幸福感基本上呈增加趋势。

第三，对居民幸福感进行了 OLS 多元回归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控制性别、年龄、城乡、收入、教育、社会地位等因素后，国民幸福感仍呈上升趋势。

由上可知：其一，过去 10 年经济和社会指标的改善已经在国民主观幸福感受中得到体现。其二，大众传媒所反映的问题虽然重要，但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写照。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比媒体透视出来的状况要幸福。其三，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研究并不支持传统的“幸福悖论”假说，至少在短期来看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改善成为政治稳定的基础，即“发展

是硬道理”。然而，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下去，尤其是目前这种以激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无法持续下去。^①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把中国的形势比作“自行车”：只有维持一定速度的情况下，稳定才有可能；一旦速度放缓甚至停滞，车身将会失去平衡。^② 目前，经济增速放缓已初露苗头。如前所述，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但是，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会随之下降。既然民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是政府治理绩效的晴雨表，要确保未来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尚需对幸福感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追踪和研究。^③

通过客观指标去测量人的主观感受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人的主观感受变化万端，通常使用的测量指标存在先天不足。此外，在影响幸福感的诸多因素中，许多变量无法测量或无法获得。本研究仅针对5个时点跟踪研究，没有进行定性访谈。囿于测量、数据、变量的局限性，我们对研究结论持审慎、开放的态度，期待借此推进更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① 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② The Economist, “Pedalling Prosperity,” May 26,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5762>, accessed on June 15, 2012.

③ 中央编译局、清华大学等单位编制，2012年6月底公布的“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居民幸福感是一项重要指标。参见钱昊平：《俞可平：强调中国特色，但不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2012年7月6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78171>, 2012年7月8日。